

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

寇 健 文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要

依照中共建政以後的重大歷史發展，中共菁英政治的相關文獻大致分成四個類別，分別是「極權主義」途徑、「派系政治」途徑、「世代政治」途徑、「技術專家政治」途徑。本文把上述四類文獻的觀點放在當今的時空背景下，凸顯它們的侷限性。本文同時指出，由於中共高層的權力來源已出現轉變，制度化應成為未來研究的新方向。

關鍵詞：政治繼承、中共、菁英政治、研究途徑

* * *

過去幾十年來，中共菁英政治與權力繼承始終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學術界經常回顧這個研究領域的發展，檢討相關文獻在理論建構、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等方面的優缺點，並評估未來研究趨勢^①。本文的目的是回顧中共菁英政治相關研究途徑的發展。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學術研討會（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暨中國大陸研究中心，2003年4月1~2日）。筆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註① 中文的文獻回顧見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頁1~15；劉平鄰，「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收錄於何思因主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初版（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頁497~525；陳婕、李秀山，「回顧美國中國研究的典範」，收錄於朱雲漢、王紹光、趙全勝主編，*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頁129~149。英文的文獻回顧見 Monte Ray Bullar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ite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sia Survey*, vol. 19, no. 8 (August 1979), pp. 789~800;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 & Hain, 1981), pp. 39~46;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0 (October 1982), pp. 934~958;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January 1984), pp. 284~307; Michel Oksenberg, "Politics Takes Command: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Post-1949 China,"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43~590;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p. 14~40; Avery Goldstein,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pp. 714~730; Lowell Dittme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vol. 32, no. 9 (September 1996), pp. 1~18;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54。這些文獻回顧的文章多半廣泛地討論中共政治研究，同時分析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等方面的變化，但都有涉獵到中共菁英政治的議題。

重點在於各研究途徑產生的歷史背景與內涵，但不包括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的演變。整體而言，新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往往刺激學者發展新的研究途徑，詮釋最新情勢。因此，回顧過去主要研究途徑出現的時空背景，以及發展出來的新議題、新解釋，就能清楚勾勒幾十年來相關研究的演變軌跡。

依照中共建政以後的重大歷史發展，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文獻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類別，分別是「極權主義」途徑（totalitarianism，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後出現）、「派系政治」途徑（factional politics，一九七〇年代文化大革命後期出現）、「世代政治」途徑（generational politics，一九七〇年代文化大革命後期出現）、「技術專家政治」途徑（technocracy，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實施幹部制度改革後出現）。第一節至第四節依序分別討論這四類文獻。不過，這種分類方式不代表個別研究途徑沒有借重其他區域研究的成果，或是舊的研究途徑完全被新的研究途徑取代，或是每一種研究途徑的重要性完全相同。舉例來說，「極權主義」途徑是借重蘇聯政治體制的研究成果。「派系政治」和「世代政治」兩個途徑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才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前者更是一九七〇年代後最重要的研究途徑，並未被「技術專家政治」取代。第五節則將上述四類文獻的觀點放在當今的時空背景下，指出它們的侷限性。同時指出制度化趨勢應成為未來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新方向，彌補現有研究途徑的不足之處。

一、「極權主義」途徑

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時代，研究中共政治菁英的學者嘗試解答兩個問題：這些政治菁英是誰？他們如何成為中國的掌權者^②？許多早期的學者著重分析中共領導人的背景、特定菁英群體的整體特徵（如解放軍高級將領或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或是從領導人的政治生涯找出他們的政治傾向與前途。這種從領導人物的人格特質、從政經驗，或政治菁英的集體特性出發，討論中共領導人掌握權力的原因是早期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重要內容。不過，要說到當時對於中共菁英政治本質的研究，就必須提及「極權主義」途徑。

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至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後，研究中共政治的主要途徑是「極權主義」^③。「極權主義」的流行與兩個因素有關：第一、當時中共建政不久，全國仍陷於高亢的革命勝利情緒。除了高崗、饒漱石事件外，中共尚未爆發嚴重的內部整肅。同時，中共套用「蘇聯模式」，在極短的時間內將中國大陸轉換為一個實行公有制的社會。這些「成就」被編織成樣板新聞，使得依賴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的外界忽略中共高層內部的分歧。

註② Goldstein,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p. 714.

註③ 不過，台灣「匪情研究」專家，如郭華倫等，很早就開始從派系鬥爭、路線鬥爭的角度分析中共政局。

第二、在一九五〇年代「極權主義」途徑支配了蘇聯研究 (Soviet studies) ^④。當時研究共黨政權的學者實際上是依循鄂蘭 (Hannah Arendt)、佛來德瑞希 (Carl J. Friedrich) 和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K. Brzezinski) 的思維發展^⑤。大家熟知的極權主義政權的基本特徵，如官方意識型態、一黨專政、秘密警察控制、壟斷思想傳播媒介、獨占國家武力、計畫經濟等，就是來自佛來德瑞希和布里辛斯基的歸納。「極權主義」的基調是政治菁英間對於國家發展方向等重大事件具有高度共識，是一種強調「菁英共識」的觀點，認為政治體系中沒有結構性因素造成政治菁英不斷衝突。

在這種現實與學術研究的時空背景下，當時學者很容易採取同樣的途徑分析中共，並反映在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學術文獻中。學者認為中共的領導人信仰馬列主義，緊密的團結在一起，以集體領導方式制定政策。同時利用強大的控制機制滲透整個社會，動員民衆支持新政權的政策目標，並利用計畫經濟制度掌握資源分配，把一個老舊的傳統社會改造為新社會^⑥。因此，中共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衝突、政策歧見大都被掩蓋或者被忽略。舉例來說，鮑大可 (A. Doak Barnett) 認為毛澤東一人已經領導中共二十餘年，是整合中共高層菁英的重要因素。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爆發的高崗、饒漱石事件外，中共黨內並未發生足以影響高度團結的派系鬥爭。儘管政策歧見確實存在，但無法證明中共高層發生嚴重「黨同伐異」問題^⑦。在這種「菁英共識」思維的影響下，當時文獻很少從「菁英衝突」的角度思考中共政治。班耐德 (Gordon A. Bennett) 就指出早期學者很少清晰地、有系統地討論中共政治菁英發生衝突的結構^⑧。

當時白魯恂 (Lucian Pye) 和馬克法夸 (Roderick MacFarquhar) 等少數學者看穿中共團結一致的表象，發現中共高層仍存在衝突。舉例來說，白魯恂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共面臨的權威危機。他指出中國人缺少安全感使得他們必須透過個人關係尋

註④ 關於「極權主義」途徑在蘇聯研究的運用，見 Gabriel A. Almond and Laura Roselle, “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 in Thomas F. Remington ed.,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System: Essays in Honour of Frederick C. Barghoor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pp. 172~177.

註⑤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註⑥ 以上觀點見 Michel Oksenberg, “Politics Takes Command: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Post-1949 China,” pp. 578~579;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 26. 「極權主義」途徑的代表性作品包括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John W.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註⑦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pp. 16~17.

註⑧ Gordon A. Bennett, “Elite and Society in China: A Summary of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 12.

求支持與安全感。這種需求無法滿足時，所引起的挫折感與憤怒很容易造成看似穩定結構的崩潰^⑨。馬克法夸則發現中共黨內高層對政策的看法並不相同，但毛澤東以其支配地位操縱中共決策過程^⑩。不過，強調「菁英共識」的「極權主義」途徑在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仍是研究主流^⑪。

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共黨世界發生幾件大事使得「極權主義」途徑受到質疑與修正，如史達林死後蘇聯發生的權力鬥爭、蘇聯與中共外交關係惡化、中共陸續爆發嚴重鬥爭等等。從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角度來說，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對於「極權主義」途徑造成很大的衝擊。由於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學者仍然將文化大革命視為極權主義政權下的產物，此即「毛澤東領導」模型 (Mao-in-command) 出現的背景。這個模型認為，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至一九六八年間，毛澤東支配了中共的決策過程，他的領導人角色、他的個人信念、他手中的資源，以及中共面對的社經問題共同決定了他的策略選擇範圍^⑫。在中共的極權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無法容忍任何路線不同的政治菁英，而毛澤東擁有的絕對權力使得他能徹底整肅意見與他不同的人。

即使如此，文化大革命仍然鬆動了「極權主義」途徑的支配地位。「毛澤東領導」模型雖然認為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與絕對的權力，但也承認中共政治菁英間不斷出現嚴重衝突，如毛澤東與劉少奇、毛澤東與林彪、四人幫與華國鋒等等。這些權力鬥爭現象使得多數學者放棄「極權主義」途徑，發展著重「菁英衝突」的研究途徑，研究的焦點也隨之從「穩定」轉為「變遷」^⑬。這就是「派系政治」、「世代政治」等途徑出現的基本原因。

儘管「極權主義」途徑如今不再是研究共黨問題的主要途徑，部分學者仍然承認「極權主義」途徑的實用價值^⑭。這些學者認為「極權主義」概念勾勒出蘇聯、中共等共黨政權早期的主要特徵，因此可以作為共黨政權演變的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研究蘇聯的學者歐多姆 (William E. Odom) 認為「極權主義」途徑掌握共黨政權的基

註⑨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8). 關於這本書論點的中文介紹，見唐光華，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魯恂（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2年），頁156~183。

註⑩ Roderick MacFarquhar, “Communist China’s Intra-party Disputes,”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December 1958), pp. 323~335.

註⑪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p. 27~28.

註⑫ 「毛澤東領導」模型的代表作品見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1949-1968,” in 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p. 79~115.

註⑬ Michel Oksenberg, “Politics Takes Command,” p. 583;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 28.

註⑭ Gabriel A. Almond and Laura Roselle, “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 pp. 176~177. 關於「極權主義」途徑是否過時的正反意見，見 Sujian Guo, “The Totalitarian Model Revisite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3 (September 1998), pp. 273~277.

本特質，此一優點是其他研究途徑無法比擬的地方^⑯。研究中共政治的學者也有人呼應這種論點。郭蘇建（Sujian Guo）指出，儘管中共政權在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大為不同，但「極權主義」的核心特質並未改變，如訴求真理的官方意識型態、一黨專政的權力結構、採取適當手段達成意識型態與一黨專政兩項目標^⑰。他進而修正佛來德瑞希和布里辛斯基對於「極權主義」政權的定義，將它的特性區分為必要成分與非必要成分。只要必要成分（如官方意識型態、一黨專政、適當手段等等）保持不變，就保持了「極權主義」的本質。至於手段的具體內涵，則可以因時因地制宜，機動調整。如此一來，便能區分政權轉型（從「極權主義」轉變成其他政權型態，如蘇聯）與政權發展（政權本質不變下的演變，如中共）^⑱。

二、「派系政治」途徑

文化大革命打破中共高層對國家發展方向具有高度共識，團結一致的假象，也促使學者發展新的途徑研究中共菁英政治。學者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極權體系下，中共政治為什麼仍然受到「衝突」的支配，造成這種衝突的動力到底是什麼^⑲？因此，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重點從菁英集體或個人特質轉向權力運作與決策過程^⑳。強調「菁英衝突」為出發點的「派系政治」途徑於是成為一個主要研究途徑，影響力延續至今。這些文獻指出中共缺乏權力競爭的遊戲規則，政治繼承往往成為不同派系間的零和遊戲。不但造成欽定接班人接掌權力的困難，也導致政局不穩定。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以後，「派系政治」逐漸成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最重要途徑。輝特森（William W. Whitson）發現解放軍高層分成以野戰軍為基礎的幾個派系，各野戰軍出身的將領很難進入其他野戰軍勢力範圍內發展，而且各派系之間並非合作無間^㉑。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中共派系是以「扈從關係」（clientelist tie）為基礎，而派系政治則按照「共識——衝突——危機」的規律不斷循環^㉒。白魯恂則

註^⑯ William E. Odom, “Soviet Politics and After: Old and New Concepts,”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pp. 66~98.

註^⑰ Sujian Guo, “Totalitarianism: An Outdated Paradigm for Post-Mao China?”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4, no. 2 (Summer 1995), pp. 62~90.

註^⑱ Sujian Guo, “The Totalitarian Model Revisited,” pp. 277~281.

註^⑲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 29.

註^㉑ 陳婕、李秀山，「回顧美國中國研究的典範」，頁 134。

註^㉒ William W. Whitson, “The Field Army in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37 (March 1969), pp. 1~30;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 498~517.

註^㉓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uary 1973), pp. 33~66. 黎安友曾修改後重刊該文。見 Andrew Nathan, “An Analysis of Factionalism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1978), pp. 387~414.

認為中國文化一方面強調領導人之間應該表現同心協力，而不是勾心鬥角；但另一方面又強調建立上司與下屬間的特殊關係（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才是官場自保之道。「共識」（表面上）與「派系」（實際上）間的緊張關係是中共政治的主要動力^②。由於制度上的弱點，這些學者認為中共政治菁英的正式職務與實際影響力間存在不協調的微妙關係。因此，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背景，如工作經歷、學校、家族、省籍等等，有助於了解中共政治的運作。這些作品共同奠定了「派系政治」途徑在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重要地位。

在一九八〇年代，「派系政治」可說是中共菁英政治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途徑。「派系政治」被廣泛運用的原因與中共政治的大環境息息相關。原本許多人認為鄧小平的改革能產生一個制度化的政治體系，使得正式職務的重要性不再受到個人非正式影響力的干擾。然而，革命元老干政顯示中共權力轉移制度化的大失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中共元老聯合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以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迫使總書記江澤民公開宣示繼續遵循改革開放路線。這些政治事件提供「派系政治」途徑持續主導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現實基礎。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外界普遍認為決定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關鍵因素是領導人的非正式影響力，而非他們所具有的正式職務^③。

（一）派系的內涵與用法

研究中共派系政治的文獻相當豐富，不過彼此的觀點未必相同。舉例來說，學者對於「派系」的內涵與用法、派系政治形成的原因、派系鬥爭的性質都曾發生重大爭辯。首先，在「派系」的內涵與用法方面，黎安友認為「扈從關係」——組成派系的基礎——是一種建立在交易基礎上的非原生性（non-ascriptive）兩人關係。在交易過程中，雙方都充分理解彼此的權利和義務。家族血緣關係、社團會員等共享的關係（corporate ties）因缺乏利益或服務交易的內涵，不包含在「扈從關係」的範圍內。同時，科層組織內上司與下屬間的權力關係也不在「扈從關係」的範圍內。這是因為下屬除了服從外，別無他途，並沒有交易的性質^④。因此，「扈從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以領導人為核心輻射出去的人際網絡，派系成員間具有上下位階不同的垂直特性^⑤。

不過，鄒謙反對「派系」一詞的用法。他認為「非正式團體」（informal groups）或「政治行動團體」（political action groups）較為恰當，因為構成派系的關係網絡不

註^②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 xi. 該書由胡祖慶翻譯成中文，書名為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年）。

註^③ Goldstein,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p. 715.

註^④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p. 37~39.

註^⑤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p. 42~44; Andrew Nathan, "An Analysis of Factionalism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pp. 390~393.

僅有上下位階的「扈從關係」，也有同儕間的個人關係^㉙。羅德明（Lowell Dittmer）更以「非正式關係的政治」（informal politics）取代「派系政治」，以擴充內涵^㉚。他認為若將中共派系侷限在具有垂直特性的關係網絡上，會排除一些形成派系的重要基礎。因為在派系形成的過程中，其他的非正式關係也會扮演一定的角色，如同鄉關係、同事關係、同校關係、家族關係等等^㉛。這些非正式關係並不具有上下位階的垂直特性，而是彼此平等的水平關係。郭學志（Xuezhi Guo，譯音）則認為關係網絡中的禮貌（etiquette）、道義與感情三個面向的重要性往往高於尋求自我利益的工具性面向，因此不應該將關係網絡完全定位在「利益交易」上^㉜。

（二）派系政治形成的原因

其次，學者對於中共派系政治形成的原因也有不同的看法。歸納來說，學者大致從「權力鬥爭」、「政策歧見」、「官僚組織利益」三個角度解釋中共派系政治發生原因^㉝。權力鬥爭模式則認為派系實質因於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因此，權力分配是派系鬥爭的關鍵，政治菁英的政策分歧僅為政爭工具。白魯恂認為權力的考量是中共派系政治的決定性因素^㉞。中國人為了壓抑心中的憂慮與不安全感，寄託於權力的保護。透過「保護——被保護」的關係，建立起可靠的私人關係^㉘。因此政策辯論只是一種表態行為，而非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象徵性意義大過實際意義^㉙。黎安友也抱

註㉙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65 (March 1976), p. 100;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of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 97, p. 131.

註㉚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 12.

註㉛ 許多學者曾經單獨分析這些彼此平等的非正式關係。關於秘書幫（領導人政治秘書）的角色，見Wei L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pp. 913~936; James C. Mulvenon and Michael S. Chase, "The Role of Mishus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aryanne Kivlehan eds.,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140~151. 關於清華幫（同校關係），見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1~30. 關於太子黨（家族關係），見Murray Scot Tanner (with Michael J. Feder),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pp. 89~119.

註㉜ Xuezhi Guo, "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6 (July 2001), pp. 69~90.

註㉝ 這個分類基本上是遵循黃靖（Jing Huang）、羅德明與吳玉山的分類方式。見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p. 29~34;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4 (July 1995), pp. 472~476.

註㉞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 127.

註㉘ *Ibid.*, pp. 137~138.

註㉙ *Ibid.*, pp. 159~196.

持類似看法。他認為中共派系在意識型態與政策路線的差異其實不大，但這些差異在權力鬥爭中被擴大，以凸顯派系間的敵我關係^④。馬克法夸（Roderick Mac Farquhar）分析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的關係後指出，他們經常因為權力與地位而發生嚴重摩擦^⑤。羅德明也認為中共領導人在特定政策上的立場並不可靠。一旦掌握優勢權力，他可能放棄原來支持的政策^⑥。泰維斯（Frederick C. Teiwes）則指出中共派系關切的焦點是職務分配，而非政策。早期中共政治菁英間的和諧實際上建立在毛澤東的最高領導人權威與各派系間職務分配的平衡^⑦。台灣早期的中共專家郭華倫也是從權力鬥爭的角度分析中共派系政治。他認為中共黨內鬥爭往往將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糾結在一起，然而權力分配仍是鬥爭的本質，政策路線歧異只是次要的。因此，路線正確與否的解釋權操諸當權派系手中，而路線錯誤只是一種攻擊政敵的號召^⑧。

政策歧見模式認為派系的出現與領導人的政策歧見不同有關。有些學者認為中共派系政治是以政策路線鬥爭為主，權力爭奪為輔，或者兩者同等重要。鄒謙強調權力鬥爭與政策歧異在中共派系鬥爭中都扮演重要角色^⑨。他認為中共政治菁英固然因為權力鬥爭而透過人際關係結盟，但政策歧異也扮演重要角色。同時，由於意識型態非常重要，中共派系往往會修改或重新詮釋意識型態，以便合理化新的政策路線。杜勉（Jurgen Domes）也認為中共高層內部爆發的政治衝突乃源於政策歧見與領導人間的敵對抗衡^⑩。蘇道銳（Dorothy J. Solinger）、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何漢理（Harry Harding）則按照政策偏好的不同，各自將中共政治菁英區分為三大類別^⑪。

註④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 49.

註⑤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3.

註⑥ 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a: A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October 1978), p. 32.

註⑦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p. 144.

註⑧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版（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政大東亞研究所，1982年），頁93~94；
郭華倫，「中共領導權鬥爭的可能結果」，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增訂版（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年），頁265~267。

註⑨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pp. 110~111;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p. 114, p. 119.

註⑩ Jurgen Domes, “Intra-Party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China,” presented for the 4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12-15, 1974), p. 2. 有趣的是，杜勉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西方觀察家大都認為中共黨內衝突來自政策歧見，東方觀察家則多半強調中共派系間的奪權鬥爭，比較不重視領導人間的政策歧見。

註⑪ 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2 (December 1982), pp. 1238~1275; Carol Lee Hamrin, “Competing ‘Policy Packages’ in Post-Mao China,” *Asian Survey*, vol. 24, no. 5 (May 1984), pp. 487~518;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p. 41~49.

雖然他們分類派系的標準並不一致，但都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共菁英政治就是這些勢力的消長與分化。因此，他們的論述代表了政策歧見模式的基本觀點。李可柔更進一步指出，造成一九八〇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一收一放」循環過程的原因，除了改革政策本身的實驗性質外，另一個原因就是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緊張關係^②。

官僚組織利益模式以西方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為理論基礎，認為中共派系衝突固然與權力鬥爭與政策分歧有關，但各黨政官僚系統的利益衝突同樣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這種情形下，生涯途徑（career path）是派系結盟的一個重要因素。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認為中共領導人經常代表其所掌管的官僚系統發言，在決策過程中他們的立場會受制於這種決策結構，因此中共政治菁英間的政策歧見或權力衝突「可能」反映了各官僚系統間的利益衝突^③。謝淑麗（Susan L. Shirk）認為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會嘗試利用「扈從關係」建立班底，同時也會倡導某些政策，滿足主要官僚機構的組織利益。支持特定政策能幫助領導人爭取官僚機構與地方負責人支持，鞏固權力基礎，在權力鬥爭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④。

黃靖則一反多數學者將派系當作被解釋的現象，將派系當成自變項，解釋派系對中共領導人間的關係與決策結果的影響^⑤。他認為中共起初在各自孤立的區域發展，使得各山頭與下屬擁有密切的關係網路。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這些在中共建政前就已經存在的關係網路轉化成派系。由於中共最高領袖的權威是建立在派系鬥爭中凝聚出來的忠貞度，他的權威與維持政局穩定所需的正式遊戲規則並不相容^⑥。隨著早期派系逐漸消失，未來中共很難再出現一個獨大的派系，這使得妥協將會成為未來中共菁英政治中的常態。

（三）派系鬥爭的性質

最後，學者對於派系互動關係的看法也不一致。黎安友認為派系比正式組織擁有較少的權力，權力的侷限性使得一個派系無法徹底消滅另一派系。因此，中共派系政治存在著某種禮節（code of civility），成為權力鬥爭的遊戲規則^⑦。苟德斯坦（Avery Goldstein）認為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間，中共菁英政治呈現的是「向優勢者靠攏」（bandwagon）——當政治鬥爭的優勢者出線後，其他政治菁英立刻表態效忠。

^{註②} Carol Lee Hamr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Changing Political Patter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0), pp. 4~7.

^{註③}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18.

^{註④}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90.

^{註⑤}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 2.

^{註⑥} *Ibid.*, p. 23.

^{註⑦}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 46.

然而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共派系政治則轉變成類似國際關係中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各派系彼此合縱連橫，防止某一派系過於強大，威脅本身利益^⑧。在「向優勢者靠攏」主導的期間，鬥爭失敗者大多不會面臨嚴厲整肅的命運，同時保有自我批評，或改變立場加入鬥爭勝利派系的機會^⑨。然而，在「權力平衡」主導的期間，權力角逐者擔心鬥爭失敗後受到整肅，因此缺乏「安全感」。白魯恂則指出後鄧時代的中共派系政治應該是「權力平衡」，因為無人能扮演毛鄧當年的角色^⑩。

鄒讜則不同意上述觀點。他認為中共派系政治是「勝者全拿」的零和遊戲，鬥爭結果始終是一個派系（或派系聯盟）徹底打敗或消滅另一派系（或派系聯盟），而非黎安友的觀點^⑪。鄒讜批評黎安友忽略正式組織與制度對於派系政治運作的影響。當一個派系掌握中共黨機器時，這個派系比其他派系擁有更多資源與工具^⑫。同時，鄒讜指出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治中，最高領導人（指毛澤東）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儘管派系不斷鬥爭，但他能以最高領導人的威望輕易壓制反對他的派系，因此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間並未出現苟德斯坦所說的「權力平衡」現象^⑬。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也認為中共政治中不乏議價妥協的現象，但政治菁英爭奪「領導核心」使得權力鬥爭必定是一派壓倒另一派的「完全勝利」（total victory），因此造成政策的劇烈變動^⑭。泰維斯則將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菁英政治類比為中國古代的宮廷政治。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力如同皇帝一般，中共其他領導人則像大臣一樣，必須揣測毛澤東的意向而調整自己的立場，爭取毛的支持^⑮。鄧小平時代中共菁英政治延續了毛澤東時代的重要特徵。最高領導人擁有至高權威，仲裁紛爭的現象仍然存在。同時，革命建國功勳的重要性造成個人化的政治權威——正式職務與實際政治權力的不協調^⑯。

羅德明的觀點又不同於上述兩種觀點。他認為即使黎安友誤認「權力平衡」是中共派系政治的常態現象，也不代表獲勝的派系從此主導一切。因為不久之後新的派系

註^⑧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7.

註^⑨ *Ibid.*, pp. 79~80.

註^⑩ Lucian W. Pye,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48~49.

註^⑪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p. 97.

註^⑫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p. 111.

註^⑬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p. 137.

註^⑭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pp. 8~10.

註^⑮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p. 144;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0*, 2nd edi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p. lxii.

註^⑯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58~59.

很可能又會出現，扮演反對當權派系的角色，因而啓動新一輪權力鬥爭。換言之，中共派系政治就在「衝突——妥協」規律下循環^⑦。同時，他認為正式職務（formal position）經常是形成非正式權力（informal power）的前提條件。因此一旦剝奪派系領導人在中共國家機器內的正式職務，這個派系的關係網絡很容易就會瓦解^⑧。

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學者對於派系的定義、派系的形成，以及派系與派系間的關係等議題的觀點並不相同。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激發學者不斷的研究，充實了「派系政治」途徑的文獻。因此，過去二十年來，「派系政治」始終是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重要途徑。

三、「世代政治」途徑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派系政治」成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流途徑，不過仍有少數學者採取「世代政治」途徑分析中共菁英政治^⑨。中共領導人在建黨之初屬於世界上非常年輕的統治菁英，然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們已經屬於最老的一群^⑩。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出現的幾次主要權力鬥爭中，參與鬥爭的核心要角分別屬於不同政治世代的人物，如鄧小平和華國鋒，以及鄧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之間。再加上參加革命建國的幹部自然凋謝，勢必讓年輕一輩幹部出頭。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之間，「世代政治」途徑曾廣泛被用來分析中共菁英政治。中共十六大前後外界觀察胡錦濤接班問題時，也經常從「世代交替」的角度分析中共菁英政治。

「世代政治」途徑和「派系政治」途徑基本上都是沿襲「菁英衝突」的脈絡，但兩者的焦點並不相同。「派系政治」的基礎是「扈從關係」，著重的是政治菁英間的垂直或水平關係網絡，以此出發討論不同關係網絡群體間的衝突。「世代政治」的基礎則是「共同經驗」，強調同一政治世代具有相近價值觀與政治傾向，與其他政治世代不同，進而探討不同世代間的衝突。

「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是指在特定年代出生的同儕群體受到某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影響，特別是在他們政治態度形成時期（formative years）——青少年後期到成人初期，大約在十七至二十五歲之間——發生的重大事件，造成共同的特殊經驗與價值觀。這些共同經驗進而影響他們的政治行為，並形成他們與其他世代

註^⑦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pp. 8~9.

註^⑧ Ibid., p. 17. 羅德明認為鄧小平等革命元老在 1980 年代只是名義上退出權力中心，因此他們的干政只是正式權力與非正式影響力的結合，而非後者壓倒前者。

註^⑨ 李成認為「世代政治」途徑最精確的名稱應該是「政治菁英世代」（political elite generations）。見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 7.

註^⑩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6), p. 196.

的差異^⑯。因此，領導人的世代交替應當被視為發展停滯社會（stagnant society）的再生力量，或是引起更廣泛變遷的激素^⑰。研究「政治世代」的學者不但研究世代差異出現的原因與造成的結果，同時也注意同一世代內因種族、階級、性別、教育、宗教等因素引起的差異與衝突^⑱。此外，他們認為世代差異未必是政治衝突的唯一來源，可能與其他衝突來源同時存在^⑲。但只要世代間的政治價值觀不同，就有必要研究世代政治的前因後果。

學者劃分中共政治菁英世代的基準不完全一致，但大致可以歸納為「長征世代」、「抗日與延安世代」、「內戰世代」、「建國世代」、「文革世代」、「改革開放世代」等幾個世代^⑳。中共本身也以入黨時間和黨員參加過的重大建黨開國事件（如長征、抗日戰爭等等）來分類黨員，更將高層領導核心分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㉑。研究中共世代政治的學者普遍認為每一個世代經歷的歷史背景並不相同，個別政治世代的政治菁英具有獨特的價值觀與政治傾向，導致每一個世代間的集體特性大

註^⑯ Marvin Rintala, "Generations: Political Gene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6 (New York: Collier and Macmillan, 1968), p. 93; William R. Klecka, "Applying Political Generation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Behavior: A Cohort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5, no. 3 (Fall 1971), p. 358; Samuel P. Huntington, "Generations, Cycles, and Their Rol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Richard J. Samuels ed., *Political Gener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7), pp. 9~13; Michael Yahuda,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80 (December 1979), pp. 794~795;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p. 101~103; Ruth Cherrington, "Generational Issu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1980s Genera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8, no. 2 (June 1997), pp. 304~305. 關於「政治世代」概念的釐清，見 Marvin Rintala, "A Generation in Politics: A Definitio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5 no. 4 (October 1963), pp. 509~522.

註^⑰ Ruth Cherrington, "Generational Issues in China," p. 303.

註^⑱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p. 7.

註^㉑ 舉例來說，白魯恂認為中共政治同時存在「世代政治」（代表水平政治分歧）與「官僚系統利益」（代表垂直政治分歧，如農業系統、石油系統等等）。見 Lucian W. Pye,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a Gerontocracy: The Chinese Succession Problem," *Current Scene*, vol. 14, no. 7 (July 1976), pp. 5~6.

註^㉒ 關於中共政治菁英世代的不同劃分方法與各世代的特質，見 Michael Yahuda,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 pp. 796~804; Lucian W. Pye, "China: The Politics of Gerontocracy," in Richard J. Samuels ed., *Political Gener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108; William deB. Mills, "Generational Change in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2,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83), p. 17;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0~51. 關於解放軍的世代劃分，見 William W. Whitson,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Gene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Case," *Asia Survey*, vol. 8, no. 11 (November 1968), pp. 925~947;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pp. 418~435.

註^㉓ Michael Yahuda,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 p. 795. 關於中共以入黨時間、參加重大事件經歷分類黨員的方法，參見 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3~45.

不相同。舉例來說，李成（Cheng Li）認為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比較沒有意識型態與教條色彩，因此對問題抱持開放的態度。同時他們擁有較強草根意識（grassroots consciousness），會注意到中國大陸的鄉村問題，也比較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⑯。這些在價值觀或是政策上的「世代差異」是中共權力衝突與政治變遷的一個（但非唯一）重要來源。世代差異雖然不是中共派系形成的關鍵，和公共政策選項的關聯性也不大，但這個因素絕對會影響各派系在鬥爭中的表現^⑰。

革命建國世代與下一個世代間的權力轉移是最容易發生世代衝突的時期。共黨國家領袖基本上可以分成英雄型領導者（heroic leadership）和官僚管理型領導者（bureaucratic leadership）^⑱。前者具有領導革命建國或是推動國家現代化的偉大貢獻，是共黨政權的締造者；後者則是政權的維護者，以解決問題、專業管理能力取勝。官僚管理型領袖多半缺乏豐功偉業，受到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注重專業、科技等現實發展需求。這些特性與英雄型領袖重視社會主義教條理論、革命建國功績的特性不同。同時，官僚管理型領導者必須將統治的合法性來源從「領袖魅力」轉化為「管理績效」，解決工業化後出現的新興社會問題。因此，當英雄型領導者日漸老化，但尚未完全退出權力圈，而官僚管理型領導者已經正式接掌重要職務，卻仍活在開國元老干政陰影下的時候，共黨政權很容易爆發「第二代危機」（the second-generation crisis）^⑲。雖然上述論點來自研究蘇聯與東歐的學者，但他們所觀察到的世代衝突現象同樣發生在中共身上——「老人政治」（gerontocracy）。

「老人政治」是指同一批人長期佔據高層領導職務，造成政治菁英往領導高層晉升的社會流動發生停滯狀態。這批人逐漸老化時，整個領導班子毫無新血，造成老人統治國家。有時甚至會發生老人已經不擔任黨政領導職務，卻仍能運用非正式影響力，干擾年輕一代領導人的決策^⑳。中共的「老人政治」在一九七〇年代逐漸形成，一九八〇年代達到頂峰，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後逐漸減弱。

中共老人政治的出現與缺少現代化的幹部退休機制有關。過去幹部退休的原因是

註^⑯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pp. 180~194, pp. 205~206.

註^⑰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 98, p. 106.

註^⑱ Alfred G. Meyer, "Communism and Leade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16, no.3 (Autumn 1983), pp. 165~169.

註^⑲ 包曼（Zygmunt Bauman）認為可能導致「第二代危機」的三大問題分別是意識型態與現實生活差距、統治菁英間的世代衝突、工業化後新興工人階級的需求未被滿足。見Zygmunt Bauman, "Twenty Years After: The Crisis of Soviet-Type System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1), pp. 47~50.

註^⑳ 除了中共之外，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也發生「老人政治」的現象，相近年齡的老人持續佔據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政治局成員的平均年齡甚至高達約70歲。見Alfred G. Meyer, "Communism and Leadership," p. 162; Jerry F. Hough, *Soviet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0), p. 151. 由於缺少「幹部年輕化」政策，當時蘇聯的領導人完全沒有退休壓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此，蘇聯並未出現老人「退而不休」，以非正式影響力干預新一代領導人決策的現象。

基於健康不良或是無法正常工作（*inability to work normally*），與年齡大小無關^②。換言之，只要高齡的領導人健康狀況良好，能夠正常工作，他們就可以繼續擔任重要職務。鮑大可更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就發現中共各級領導班子的老化現象^③。這種缺乏以年齡為基礎的退休機制又與文化因素有關。在亞洲傳統社會中，人們普遍認為領導人應該具有智慧與經驗，而智慧與經驗都與年齡有關^④。在尊重長者的文化因素下，長者「資深」（seniority）地位可以轉化為權力，無論其是否具有正式職務^⑤。

在心理層面上，中共開國領導人認為他們具有特殊的「長征」經驗，非其他年輕幹部所能相比。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等重大事件又分別造成躬逢其時的幹部一種特殊的心態，成為各個政治世代的心理基礎。當某一個世代幹部長期等待上一世代退休之際，自然不願見到革命經歷不如自己的下一世代幹部竄升，擠壓自己的仕途發展空間。同時，過去幹部升遷往往侷限在特定官僚系統，很難轉入其他系統晉升。結果造成幹部升遷管道狹窄、速度緩慢的現象^⑥。

此外，文化大革命對於「老人政治」的出現也有一定影響。多數老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許多較年輕幹部因文革而快速晉升。當四人幫倒台以後，鄧小平等人大量平反這些老幹部，取代文革受益者，造成中共幹部整體的老化。因此，文革結束後中共領導班子老化的程度比毛澤東時代還嚴重^⑦。

四、「技術專家政治」途徑

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起，中共菁英政治研究出現新的研究途徑——「技術專家政治」。這個研究途徑的出現與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也有關係。自一九七八年中共決定改革開放路線後，急需大量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推動經濟發展。然而，多數老幹部的文化水平較低，缺乏推動經濟建設的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無法擔任改革開放的重責大任。因此，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起，中共推動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四化政策，以素質較高的幹部，取代老幹部。在這個政策下，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

註^②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s in China*, p. 64.

註^③ A. Dao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33~434.

註^④ Lucian W. Pye, “China: The Politics of Gerontocracy,” p. 112;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 103.

註^⑤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 99.

註^⑥ Lucian W. Pye,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a Gerontocracy,” p. 7.

註^⑦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pp. 105~106. 關於 1976 年至 1977 年間中共中委會出現的「反淘汰」現象——年長幹部取代年輕幹部擔任中委，參閱 Jurgen Domes, “‘The Gang of Four’ and Hua Guo-feng: Analysis of Political Events in 1975-1976,” *China Quarterly*, no. 71 (September 1977), pp. 493~494.

員結構從一九八二年十二大開始出現以技術專家取代保守老幹部的趨勢^⑧。經過多年的新陳代謝，中共幹部的整體特質已出現重大改變。新一代的中共政治菁英不但教育程度遠高於過去，許多人具有工程師、經濟師、研究員、教授等專業職稱，個人素質遠比革命世代的政治菁英優良。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第三代領導人以降，多數中共領導人都可以歸類為技術官僚（technocrats）出身。中共十六大選出的胡錦濤等九位政治局常委更是全部都有工程師的專業頭銜。在科技、財稅、金融、貿易等生產與管理部門工作的官員尤其具有高學歷、專業性強的特性。由於技術官僚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學者開始討論這些技術官僚的特質，以及他們對決策的影響。

根據李成和懷特（Lynn White）的分析，「技術專家政治」這個名詞首先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⑨。這個理論認為經濟混亂和社會問題只有靠科學才可以解決，所以政府應該由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專家組成。在現今社會中，技術官僚是具備專業能力和大學學歷的掌權者，以規劃能力見長，靠著研究和管理的實際經驗建立他們的統治合法性，而非純粹依賴政治、軍事背景^⑩。利用「技術專家政治」途徑分析中共菁英政治的學者認為，中共新一代菁英多半為技術官僚與管理者出身，具有「工業技術教育」、「專業經驗」與「重要職位」等三個特性^⑪。他們在政治經驗、意識型態、行政能力與價值取向等方面都不同於動員者（mobilizers）與意識型態理論家（ideologues）出身的上一代菁英^⑫。相較於參加革命建國的老幹部，技術官僚出身的政治菁英具有科技民族主義的思想（techno-nationalism），更重視科學技術，也更支持改革開放的路線。同時，他們特別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對群眾運動抱持懷疑的態度。一般來說，他們具有理性務實的色彩，少一些意識型態與教條的包袱，專業知識與能力也大幅提升，但缺少在國家機器所有重要部門（特別是軍方）的歷練^⑬。在缺乏革命建國功績的情形下，他們必須透過促進經濟發展來鞏固執政的合法性^⑭。

註^⑧ William deB. Mills, “Generational Change in China,” p. 32; Hong Yung Lee, “China’s 12th Central Committee: Rehabilitated Cadres and Technocrats,” *Asian Survey*, vol. 23, no. 6 (June 1983), p. 674.

註^⑨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 (April 1988), pp. 388~389.

註^⑩ *Ibid.*, pp. 390~391.

註^⑪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6, no. 3 (March 1998), p.231; Cheng Li,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9~21.

註^⑫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 371.

註^⑬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pp. 194~206;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403~405.

註^⑭ Cheng Li,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p. 37.

運用「技術專家政治」途徑的學者經常使用統計方法歸納中共高級幹部的年齡、族裔、學歷、專長、晉昇途徑，驗證他們對當前中共政治菁英特性的論點。由於中共革命幹部與技術官僚正好屬於不同的政治世代，有的學者將「技術專家政治」和「政治世代」兩個研究途徑結合起來，從理工科教育背景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兩方面探討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的特性^⑮。

不過，技術官僚出身的政治菁英並非一個完全同質的群體。他們缺少經由「革命情感」建立的政治凝聚度（political solidarity），在教育背景、仕途路徑與工作經驗，以及政策偏好等方面也呈現多元化的現象^⑯。在這種情形下，由技術官僚組成的中共領導班子具有濃厚的集體領導色彩，比較依賴正式的程序規則，更需要透過協商、議價、妥協完成決策^⑰。這個特性可能成為中共決策過程制度化的第一步。

此外，學者對於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是否純粹為「技術專家政治」曾有爭論。李成和懷特等人認為技術官僚出身的政治菁英已經掌握中共決策中心^⑱。臧曉偉（Xiaowei Zang）則認為中共實際上是由技術官僚與黨務／政府行政幹部共同治理，而非單純的專家治國。換言之，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應該是「政治－技術專家政治」（political-technocracy）。雖然技術官僚在中共政治菁英中的比例確實增加，但他研究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政府與軍委，以及省委正副書記與政府省長的結果顯示，黨務／政府行政幹部的重要性並未喪失。就如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類似趨勢，中共技術官僚與年輕一代黨務／政府行政幹部同時被拔擢（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而且這兩種菁英在政壇中的角色無法相互取代^⑲。儘管這個辯論存在，新一代菁英的科技特質仍提供了分析中共政策的科學標準，取代了以往著重意識形態的立場^⑳。

此外，改革開放以後，大陸各省自主性提高，部分學者開始注意逐漸崛起的省級和副省級黨政領導幹部。除了分析他們的學經歷等基本背景外，也討論他們推動地方經濟的影響^㉑。這些分析省級幹部的文獻雖然並未處理權力繼承的問題，卻能凸顯省

註^⑮ Lyman Miller, “Overlapping Transitions in China’s Leadership,” *SAIS Review*, vol. 16, no. 2 (Summer-Fall 1996), pp. 22~23. 結合「世代政治」與「技術專家政治」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典型例子是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見該書第一章至第二章、第六章至第七章。

註^⑯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pp. 217~232;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p. 406.

註^⑰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pp. 234~240;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pp. 406~407.

註^⑱ 他們的觀點散見於本節引用的他們的作品。

註^⑲ Xiaowei Zang, “Elite Form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Technocracy in Post-Mao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4, no. 1 (March 1991), p. 123; Xiaowei Zang, “Provincial Elite in Post-Mao China,” *Asia Survey*, vol. 31, no. 6 (June 1991), p. 523; Xiaowei Zang,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ust 1993), pp. 801~802.

註^㉑ Goldstein,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p. 716.

註^㉒ *Ibid.*, p. 718. 相關作品包括 Zhiyue Bo,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級幹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已經成為晉升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歷練。

五、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何處去：制度化趨勢？

綜合前面四節的討論可以發現，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成果相當豐碩。若從個別研究途徑的影響力來看，「派系政治」可說是研究中共菁英政治最重要的途徑。從第二節的討論可以發現，無論是在理論建構或是實例分析上，這個途徑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相較起來，其他三個途徑的理論發展潛力和解釋力都遠不如「派系政治」途徑。「極權主義」途徑是根據極權國家實例發展出來的研究途徑，然而這個途徑的實用性已經相當有限^⑫。中共高層已經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的合縱連橫，以及幹部任免退休規範的相繼出現已非「極權主義」途徑所能說明。「世代政治」途徑在探討世代差異與「老人政治」方面有其重要貢獻，但只有在領導人分屬不同世代的情形下，才能提供中共菁英政治的部分解釋。因此，「世代政治」途徑無法解釋一九九〇年代後期第三代領導班子的運作。「技術專家政治」途徑也面臨類似的困境。「技術專家政治」研究途徑的出現增加了中共政治菁英研究的多元化，但不能精確解釋中共政治菁英間的互動與高層政治運作模式，因此無法取代「派系政治」成為主流研究取向。同時，這個研究途徑不易證明政治菁英組成結構與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間的關係。

一九九〇年以後，中共菁英政治研究進入停滯期。雖然仍有新的作品，但無法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巴克曼（David Bachman）認為七個因素造成美國學術界不重視中共政治菁英研究：（一）中共政治過程仍未透明化，使得學者必須依賴正確性堪慮的香港出版物。（二）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起，就有人討論中共繼承問題，但對鄧小平死亡的長期等待，以及中共政治發展的停滯造成學者無法提出新的觀點，妨礙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三）許多後鄧時期的政治人物缺乏魅力，讓人不願花時間研究這些無個性且無趣的人。（四）高層互動是否能全面解釋中共菁英政治是有疑問的。（五）地方黨政單位遠較中央單位容易接觸，是比較好的研究選擇。（六）學者掌握的人事資料可能被將來公佈的史料證實為錯誤的，如此一來研究中共菁英的意願就很難提升。七、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未來會發生民主轉型，似乎沒有必要研究這個註定毀滅的政治體系^⑬。因此他認為一九九五年《The China Journal》出版「派系政治」特刊（一九九五年七月的第34期）後，有關中共菁英政治本質的全面性、深度辯論幾乎不存在^⑭。

^{註⑫} Gabriel A. Almond and Laura Roselle, "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 p. 206.

^{註⑬} David Bachman, "Emer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Deng China," in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 eds., *China under Jiang Zemin* (Boulder, Corolardo: Lynne Rienner, 2000), pp. 55~56. 該書由張鐵志、林葦芸翻譯為中文，書名為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從十五大走向二十一世紀（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

^{註⑭} David Bachman,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 95.

然而，隨著中共開國元老不斷凋零，老人政治的影響力逐漸降低。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起，少數學者開始思考老人政治減弱後對高層政治運作的影響，探討鄧小平時代與江澤民時代中共菁英政治的差異。巴克曼可說是外界注意中共權力轉移過程可能出現制度化趨勢的先驅者。他觀察到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後逐漸形成的一些規範（norms）或其他結構因素將會制約權力繼承鬥爭的激烈程度。根據他的分析，後鄧時期的中共權力鬥爭受到三個因素的制約：第一、維持政局穩定和國家統一；第二、將權力競爭侷限為宮廷政爭，排除一般民眾介入的機會；第三、降低競爭失敗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避免權力鬥爭成為生死之爭^⑤。

近兩年來，前述巴克曼的思路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二〇〇一年 *The China Journal* 再度發行特刊（二〇〇一年一月的第 45 期），邀請學者針對江澤民時代中共政治的本質進行討論。巴克曼又指出中共菁英政治已經出現制度化的趨勢。他認為過去十年來中共菁英政治一直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而這套權力遊戲的規則包括正式文件與制度，以及政治菁英間的不成文共識。然而，相關文獻卻很少探討江澤民時代中共菁英政治的遊戲規則或慣例，以及這些遊戲規則或慣例未來如何演變^⑥。

巴克曼的觀點受到參與討論的羅德明和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支持。羅德明指出中共尚未步入集體領導和理性選擇的穩定時代，但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政治確實出現制度化的趨勢。因此，許多源自鄧小平時代的幹部制度改革方向已經逐漸成形，如任期制與退休制^⑦。沈大偉認為中共高層運作的制度化趨勢展現在兩方面：第一、現在決策過程必須經過諮詢機構及許多不同決策者的研議^⑧；第二、在一九八〇年代時，退休制度還只是原則性規範，但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卻已經落實在高層幹部身上，因此現在已經沒有所謂永遠的領袖以及老人政治。中共菁英政治不再是零和遊戲，權力也不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整個制度^⑨。李成、鄭世平（Shiping Zheng）也曾經發表過類似看法。他們認為雖然拉關係、走後門等非制度性現象仍然存在，但近年來中共政治確實也出現許多制度化的新成分，如明確的生涯途徑、年齡限制與任期限制，這些規範都會降低中共政治的「人治」色彩，使得制度化成為政治繼承中的重要因素^⑩。

註^⑤ David Bachman,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 Survey*, vol. 32, no. 11 (Nov. 1992), pp. 1051~1053.

註^⑥ David Bachman,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p. 95.

註^⑦ 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 58.

註^⑧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no.45 (January 2001), pp. 104~105.

註^⑨ *Ibid.*, pp. 106~107.

註^⑩ Cheng Li, "China's Political Succession: Four Myth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May 2001), p. 2, <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org/pdf/gac/0105chinamyths.pdf>; Cheng Li, "After Hu, Who? -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in Await Promo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 (Winter 2002), p.11, <http://www.chinaleadershipmonitor.org/20011/CLM20011CL.pdf>; Shiping Zheng, "Crossing the Political Minefields of Succession: From Jiang Zemin to Hu Jintao," in John Wong and Zeng Yongnian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3), pp.63~66.

泰維斯也承認中共政治中的制度因素已經越來越重要^⑩。他認為過度強調權力鬥爭的分析方式低估中共繼承政治朝向制度化發展的長期趨勢，以及毛澤東死後中共政治菁英非常重視穩定與和諧（stability and unity）的心態^⑪。中共領導人已經發展出一些鬆散、準制度性的標準處理整個過程，因此江澤民時代的政治繼承是一種「受駕馭的制度主義」（managed institutionalism）——意指繼承程序已經部分制度化。這些標準包括年滿七十歲必須從政治局或其他領導人職務退休；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的兩任任期限制；每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都會甄補一些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領導人進入政治局，為下一個世代接班人選進行先期培養；政治局成員結構代表不同機構、不同專業與地方的利益；政治成員連任至退休年齡為止；在繼承人接班前至少一屆（五年）便確定人選，以減少權力轉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⑫。

香港資深專欄作家丁望嘗試找出中共選拔任用幹部的規範。內容包括「年齡邊界」（各領導階層幹部離退休的年齡規定）、「任期邊界」（部分國家重要職務的任期與連任次數）、「十五大模式」（年滿七十歲者不能進中委會）^⑬。其他線索還包括「權威確認」（有上級領導鼎力支持）、「資歷優勢」（人事交流累積的多種職務歷練）、「順位優勢」（領導層職級高、排名高，在同世代中處於「先行」者，尤其是能夠提早進入政治局者）、「政見和政績優勢」（與最高當權者理念相符，並能實際工作上落實最高當權者理念）、「群體代表性優勢」（少數族群或婦女幹部）^⑭。雖然他的作品是屬於傳記性質的書籍，但仍值得注意。其中像年齡限制、任期限制、少數族群等成文或是不成文規範都是明顯的趨勢。

寇健文注意到中共選拔任用幹部逐漸制度化的趨勢，並且指出中共十六大是決定權力繼承是否會朝制度化進一步邁進的重要關鍵^⑮。他認為中共推動「幹部年輕化」後形成的離休年齡與任期限制等規範，已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一項重要遊戲規則，勢必影響黨內不同派系間與不同世代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因此提供了觀察中共菁英政治的線索^⑯。如果不能掌握這些遊戲規則及其發展方向，外界的分析很容易出現盲點。

學者對於中共權力繼承是否繼續制度化的看法並不一致。巴克曼、李成等人強調中共菁英政治中已經制度化的部分，而這些新發展正好襯托出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的最大差別。不過，其他學者抱持保留的態度。羅德明雖然承認制度化的趨勢確實

註^⑩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p. 56, fn. 4.

註^⑪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Previous Patterns and a New Process," in John Wong and Zeng Yongnian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 23.

註^⑫ *Ibid.*, pp. 44~51.

註^⑬ 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強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0年），頁14。

註^⑭ 同前註，頁40~42；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年），頁164~167。

註^⑮ 寇健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5期（2001年5月），頁1~16。

註^⑯ 寇健文，「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頁68~69。

存在，但尚未發展到穩定的狀態^⑩。謝淑麗認為中共最高領導階層的制度化，如總書記以外的政治局常委年滿七十歲時就必須退休，確實減少政治上的不可預測性。雖然這些遊戲規則有助於規範政治競爭與提升決策品質，但尚未完全改變中共政治的本質^⑪。她甚至引用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觀點，認為制度化是可轉變的，是在位者為了維持自己權力而設計。即使第三代領導核心下臺，江澤民及其他領導人也可能會學習鄧小平實行老人政治^⑫。泰維斯則認為現存中共政治體制與繼承政治規範仍然脆弱，未來將面臨補充政治局新血和讓現有成員連任至退休年齡之間，以及貫徹領導人退休年齡和維持領導班子傳承與穩定之間的兩項困難抉擇^⑬。寇健文也是抱著比較謹慎的態度。他認為權力金字塔頂端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是否能制度化目前不夠明朗。

從上述文獻來看，中共權力繼承是否能制度化仍不明朗，但相關法規與慣例不斷出現卻是事實。這些新的現象正好襯托出現有研究途徑不足之處——無法回答這些發展對中共菁英政治本質的影響。「派系政治」途徑著重中共菁英政治中的「非正式」（informal）面向，當然有不可抹滅價值。個別幹部的晉升或調職不可避免地受到走後門、拉關係等「非制度因素」的影響。但幹部任職年限、離職或退休年齡、各級領導班子成員的年齡配置，中委經歷與文化水平等規範仍對中共權力遊戲產生一定的拘束力，影響高層權力運作方式與派系鬥爭。因此，在江澤民時代，中共菁英政治呈現「非正式」和「正式」兩股力量並存交錯的現象。現在的關鍵是後者是否能成為主導力量，壓過前者。「派系政治」途徑過於偏重中共菁英政治中「非正式」面向，未能深入探討中共高層運作出現成文規定或不成文慣例的原因，未能評估這些規範繼續發展的可能性，也未能檢驗「非正式」和「正式」兩股力量並存競爭對中共政權的影響。

舉例來說，從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的人事佈局來看，中共應已形成政治局常委年滿七十歲後不連任的不成文慣例（總書記的年齡限制仍不夠明確，無法下斷言）。如果這項年齡限制繼續存在，將對中共派系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共開國元老退出政壇後，主要派系的領袖大都是政治局常委。由於派系形成的基礎是以領導人為中心的關係網絡，一旦他們必須屆齡退休，勢必牽動各派系的分合。

同時，中共透過「梯隊接班」模式和幹部選拔的制度化，不斷甄補中青年幹部。防止現任領導人老化時，接班人沒有足夠時間歷練的問題。這些方法雖然不能消除派系鬥爭，卻可以透過長期培養、歷練中青年幹部的方法，逐漸形成權力繼承競賽中的領先群。由於「梯隊接班」降低未來繼承人選的不確定程度，應該可以避免現任領導人死亡或解職後出現權力真空的狀態。這種還在發展中的特殊繼承機制不但降低敵對

註^⑩ 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p. 65.

註^⑪ Susan L. Shirk,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Success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139~142.

註^⑫ *Ibid.*, p. 139.

註^⑬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Previous Patterns and a New Process," p. 56.

派系使用暴力解決權力繼承的可能性，也限制了派系鬥爭的激烈程度，進而有助於政局穩定。外界應該開始評估中共權力繼承「制度化」的可能性，並將派系鬥爭放在「制度化」趨勢的框架下討論。這將有效提高外界對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了解，重新解讀中共菁英政治。換言之，這些「制度化」的趨勢將成為未來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新材料^⑫。

* * *

(收件：92年9月2日，接受92年10月27日)

^{註⑫} David Bachman,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p. 100.

A Study of Chinese Elite 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ien-wen Kou

Abstract

Literature o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research approaches; these approaches are: totalitarianism, factional politics,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technocrac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se approaches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tools for a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lite politics.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of the source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author proposes a fifth approach--institutionalization--to analyze Chinese elite politics.

Keywords: political succession; China; elite politics; research approach



參 考 文 獻

- 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年）。
- 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強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2000年）。
- 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
- Lucian W. Pye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年）。
- 唐光華，**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魯恂**（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2年）。
- 陳婕、李秀山，「回顧美國中國研究的典範」，朱雲漢、王紹光、趙全勝主編，**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版（台北市：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政大東亞研究所，1982年）。
- 郭華倫，「中共領導權鬥爭的可能結果」，郭華倫，**中共問題論集**，增訂版（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年），頁265~267。
- 寇健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5期（2001年5月），頁1~16。
- 寇健文，「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頁63~72。
-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編，張鐵志、林葦芸譯，**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從十五大走向二十一世紀**（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
- 劉平鄰，「美國學者對中共政治的研究」，何思因主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初版（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頁129~149。
- Almond, Gabriel A., and Laura Roselle, "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 in Thomas F. Remington ed.,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System: Essays in Honour of Frederick C. Barghoor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pp.172~177.
-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 Bachman, David,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 Survey*, vol. 32, no. 11 (Nov 1992), pp. 1046~1062.
- Bachman, David, "Emer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Deng China," in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 eds., *China under Jiang Zemin* (Boulder, Corolardo: Lynne Rienner, 2000), pp. 35~70.
- Bachman, David, "The Paradox of Analysing Elite Politics under Jiang,"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95~100.
- Barnett, A. Doak,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 Barnett, A. Doak,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Bauman, Zygmun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Crisis of Soviet-Type System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1), pp. 45~53.
- Bennett, Gordon A., "Elite and Society in China: A Summary of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p.3~37.
- 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 Bullard, Monte Ra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ite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sia Survey*, vol. 19, no. 8 (August 1979), pp. 789~800.
- Cherrington, Ruth, "Generational Issu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1980s Generation of Young Intellectu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8, no. 2 (June 1997), pp. 302~320.
- Dittmer, Lowell, "Bases of Power in China: A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October 1978), pp. 26~60.
- Dittmer, Lowell,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1~34.
- Dittmer, Lowel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vol. 32, no. 9 (September 1996), pp.1~18.
- Dittmer, Lowe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53~67.
- Dittmer, Lowell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4 (July 1995), pp. 467~494.
- Domes, Jurgen "Intra-Party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China," presented for the 4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12-15, 1974).
- Domes, Jurgen, "The Gang of Four' and Hua Guo-feng: Analysis of Political Events in 1975-1976," *China Quarterly*, no. 71 (September 1977), pp. 473~497.
- Fewsmith, Josep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 Friedrich, Carl J.,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Goldstein, Avery,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oldstein, Ave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pp. 714~730.
- Guo, Sujian, "Totalitarianism: An Outdated Paradigm for Post-Mao China?" *Journal of*

-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4, no. 2 (Summer 1995), pp. 62~90.
- Guo, Sujian, "The Totalitarian Model Revisite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3 (September 1998), pp. 273~277.
- Guo, Xuezhi, "Dimensions of Guanxi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6 (July 2001), pp. 69~90.
- Hamrin, Carol Lee, "Competing 'Policy Packages' in Post-Mao China," *Asian Survey*, vol. 24, no. 5 (May 1984), pp. 487~518.
- Hamrin, Carol Lee,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Changing Political Patter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0), pp. 4~7.
- Harding, Harry,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0 (October 1982), pp. 934~958.
- Harding, Harry,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January 1984), pp. 284~307.
- Harding, Harry,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 Harding, Har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pp. 14~40.
- Hough, Jerry F., *Soviet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0).
-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untington, Samuel P., "Generations, Cycles, and Their Rol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Richard J. Samuels ed., *Political Gener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7).
- Klecka, William R., "Applying Political Generation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Behavior: A Cohort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5, no. 3 (Fall 1971), pp. 358~373.
- Lee, Hong Yung, "China's 12th Central Committee: Rehabilitated Cadres and Technocrats," *Asian Survey*, vol. 23, no. 6 (June 1983), pp. 673~691.
- Lewis, John W.,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 Li, Cheng,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p. 194~206; Lee Hong Yu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Li, Cheng,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1~30.

- Li, Cheng,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40.
- Li, Cheng,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 Li, Cheng, "China's Political Succession: Four Myth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May 2001), p. 2, <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org/pdf/gac/0105chinamyths.pdf>.
- Li, Cheng, "After Hu, Who? -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in Await Promoti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 (Winter 2002), p.1, <http://www.chinaleadershipmonitor.org/20011/CLM20011CL.pdf>.
-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 (April 1988), pp. 388~389.
-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vol. 36, no. 3 (March 1998), pp.231~264
- Li, We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pp. 913~936.
- Lieberthal, Kenn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MacFarquhar, Roderick, "Communist China's Intra-party Disputes,"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December 1958), pp. 323~335.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nion, Melanie,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eyer, Alfred G., "Communism and Leade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16, no. 3 (Autumn 1983), pp. 161~169.
- Miller, Lyman, "Overlapping Transitions in China's Leadership," *SAIS Review*, vol. 16, no. 2 (Summer-Fall 1996), pp. 21~42.
- Mills, William deB., "Generational Change in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2, no. 6 (November- December, 1983), pp. 16~35.
- Nathan, Andrew,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January 1973), pp. 33~66.
- Nathan, Andrew, "An Analysis of Factionalism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in Frank P. Belloni and Dennis C. Beller eds.,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1978), pp. 387~414.
- Odom, William E., "Soviet Politics and After: Old and New Concepts,"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pp. 66~98.
- Okzenberg, Michel,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1949-1968," in 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p. 79~115.
- Okzenberg, Michel, "Politics Takes Command: 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Post-1949 China,"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43~590.
- Putnam, Robert 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6).
-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8).
- Pye, Lucian W.,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a Gerontocracy: The Chinese Succession Problem," *Current Scene*, vol. 14, no. 7 (July 1976), pp. 1~8.
- Pye, Lucian W., "China: The Politics of Gerontocracy," in Richard J. Samuels, ed., *Political Gener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7).
- Pye, Lucian W.,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 & Hain, 1981), pp. 39~46.
- Pye, Lucian W.,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35~53.
- Rintala, Marvin, "A Generation in Politics: A Definitio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25 no. 4 (October 1963), pp. 509~522.
- Rintala, Marvin, "Generations: Political Gene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6 (New York: Collier and Macmillan, 1968).
- Shambaugh, David,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101~111.
-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Shirk, Susan L.,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Shirk, Susan L.,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Success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139~142.
- Solinger, Dorothy J.,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2 (December 1982), pp. 1238~1275.

- Tanner, Murray Scot, (with Michael J. Feder),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pp. 89~119.
- Teiweis, Frederick C.,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 Teiwei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0*, 2nd edi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 Teiweis, Frederick C.,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55~94.
- Teiweis, Frederick C.,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Previous Patterns and a New Process,"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3), p. 21~58.
- Tsou, Tang,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65 (March 1976), pp. 98~119.
- Tsou, Tang,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or a Game of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95~156.
- Walker, Richard L.,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Whitson, William W., "The Concept of Military Gener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Case," *Asia Survey*, vol. 8, no. 11 (November 1968), pp. 925~947.
- Whitson, William W., "The Field Army in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37 (March 1969), pp. 1~30.
- Whitson, William W.,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 Yahuda, Michael,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80 (December 1979), pp. 793~805.
- Zang, Xiaowei, "Elite Forma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Technocracy in Post-Mao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24, no. 1 (March 1991), pp. 114~123.
- Zang, Xiaowei, "Provincial Elite in Post-Mao China," *Asia Survey*, vol. 31, no. 6 (June 1991), pp. 512~525.
- Zang, Xiaowei,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ust 1993), pp. 787~803.
- Zheng, Shiping, "Crossing the Political Minefields of Succession: From Jiang Zemin to Hu Jintao,"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3), pp. 59~85.